

●李 严

同类书排列标准化问题

图书馆的藏书按照一定的分类体系归类以后,将同一类号下的图书集中在一起,相近学科的图书连在一起,形成了按学科系统排列和检索图书的分类体系。至此,图书分类工作似乎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可划句号了。但从图书馆对图书进行科学管理来说,仅按一定的分类体系给每种书一个代表其学科内容或其它特征的分类号码,尚不能多快好省地为读者服务。分类只是将同类号下的图书归在一起,而在一个类号下的图书有的有几种,几十种,多至几百种,如何将同一类目下的多种图书个别化,是图书分类后必不可少的工作。也可将其视为图书分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类书的排列既关系到图书馆的科学管理,也关系到为读者服务,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

同类书排列的产生和发展

是否可以这样认识,自有图书分类法以来,就存在着同类书的排列问题。在我国,公元前6年由刘向、刘歆父子相继完成的,以分类目录形式出现的第1部综合性分类体系《七略》就反映出同类书的排列问题。在同类之下,或以体裁分,或以时代分,或以著者分,有其一定的排检规律。从《七略》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几乎均运用这种方式。究其原因:一是古代的图书分类,其目的之一在于“辨章学

术,考镜源流”。类下有序,说明学术源流,故同类之下常以源流次第,并辅以体裁、时代、著者。掌握学术源流的读者,很容易找到他所需要的图书。二是古代书少,查找并不困难。故近两千年来,无人作为同类书的排列大伤脑筋。

以标记符号代表类目的分类法问世以后,图书归类只写代表该类目的分类号码,并以分类号码来排检图书。但仅有分类号码达不到每种书甚至每册书的个别化。所以《杜威十进分类法》刊行后,就有了《卡特号码表》,用以解决同类书号的排列问题。我国学习杜威分类法,编制了具有现代特征——以标记符号代表类目的新型图书分类法和汉字著者号码表。1925年,杜定友编制《世界图书分类法》,并编了著者号码表。王云五编《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也规定用他自己创造的四角号码法来编著者号码。刘国钧编《中国图书分类法》时虽未自编著者号码表,但明确规定各图书馆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使用某一著者号码表(杜定友的、万国鼎的、王云五的、卡特的),并规定了取著者号的规则和方法。刘国钧还说明他所以这样做,是由于当时没有比较完善的统一的图书分类法,很难要求著者号统一。

全国解放以后,图书馆界有识之士认识到编制一个好的著者号码表关系到整个图书馆工作的开展。大家纷纷行动或以汉字的形位,或以汉字的音序编出的著者号

码表不下三四十种。特别是汉语拼音方案的推广加速了利用拼音字母编制著者号码表的研究和讨论。1960年1月8日,北京图书馆科学方法研究部召开了《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的专题座谈会,在京的一些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的编制者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到会20多人会上着重讨论了用拼音字母编制著者号码表应具备的条件,两种不同的编表方法(查号法和拼号法)的优缺点和利用汉语拼音组织图书馆的目录等问题。1月15日,又就两种编制方法作了更深入的讨论。会议虽有不同意见,但倾向性是比较清楚的,即以汉语拼音编制著者号码表优于按字形编表,查号法优于拼号法。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以后,研究编制著者号码表的工作又向纵深发展。1980年,天津《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召开了同类书区分的笔谈会,介绍了各自采用的和自编的著者号码表,并讨论了著者号与种次号的优缺点。1981年,河南省图书馆学会召开了书次号研讨会,提交的著者号码表有近10个,还有论文10余篇。接着逐步开展了集体研究,以期取各家之长,编制出一个较为完善的著者号码表。198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在杭州召开了同类书排列号研讨会。此后,河南省图书馆学会和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分别成立了著者号课题组,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取各家之长,自我完善。河南编出了《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浙江编出了《中文同类书字顺号码表》。1990年8月,在杭州召开中文同类书标准化研讨会,会上提出7个表和10余篇论文,但仅就河南表和浙江表进行了重点讨论,并决定由北京图书馆牵头成立领导小组,负责吸取两表的优点,合为一表。1990年12月,在南宁召开的《中图法》及有关标准化问题研讨会上,领导小组将两表合一的《中文同类书排列规则——汉语著者号码表》作为国家标准送

审稿提交大会讨论,似未取得一致意见。据悉1991年将召开它的论证会。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著者号码表已经向统一和标准化的方向发展。我们期待着它的成功。

书次号与分类目录组织的关系

由于有了以标记符号代表类目的图书分类法,解决同类书排列问题也必须用标记符号。用以区分同类号下书的号码,通常称之为书次号,也有称书码的。顾名思义,也就是表示书的次第的号码。没有书次号就不能使同类号下之书个别化,就不便于科学管理。书次号是代表某一种书不可缺少的号码之一。那末,书次号和分类号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都知道,分类号是类目的代号。类分图书时,主要是根据图书的内容,确定该书属于哪个学科,在已经选定的分类体系中找到它的位置,并给以代表这个位置的分类号码。这个分类号码通常称为主要分类号。主要分类号代表图书在分类体系中的位置,也是书在书架上的位置。有了主要分类号还要再加上书次号,才能使每一种,甚至每一册图书个别化。否则同类图书无法个别化,也无法排列分类目录。从这个意义上说,书次号是图书分类的深化和延续。有的同志依此用从属关系来说明书次号和分类号是不可分割的。其实,这种认识并不确切。因为我们称书次号是图书分类的深化和延续,只是就同类图书个别化这一点来说的,和图书分类的深化和延续不是一个概念,有着明显的区别。图书分类的深化和延续是指在归类时,可以归入上位类(比较概括性的类目),若要分得细一点。专指度强一些,还

可继续往下分(比较专指的类目),这种上下位类的关系,称之为从属关系。也就是说,下位类一定带有其上位类的属性。而主要分类号和书次号就不存在这种在学科性质上的从属关系,也不存在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它们之间不是分类概念上的从属关系。书次号的作用是附属于分类号的;它必需和主要分类号一起,构成一书的索书号。若遇同类同著者的不同著作,或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不同译本,还要加辅助区分号,才能构成一书完整的分类索书号。在解释分类索书号的构成时,总是说,分类索书号=主要分类号+书次号+辅助区分号。馆员据以排列图书,出借图书,读者据以借阅图书。由此可见,书次号是离不开主要分类号的,若离开分类号则成为毫无意义的符号。书次号不能单独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和主要分类号是依附关系,也可说是主从关系。主要分类号为主,书次号为辅。

书次号与主要分类号不是学科体系中的从属关系。它们之间虽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总是为实现同类书号的个别化而取号。考虑问题总离不开书,离不开书的特征。于是人们想了很多取书次号的方法,如以书的著者取号,以书名取号,以书的出版年月取号,以书的分编先后取号——称种次号,还有以著者、书名和书的页码混合取号……,不下数十种。这多种方法中以种次号和著者号较为多见。

在我国,用种次号作为取书次号的方法已占主要地位。种次号的优点是号短、简单、易学,所以能很快推广。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它没有规律可循,不反映书的特征,同类同著者的书不能集中在一起,而且要附加其它的辅助条件,如种次号记录卡和各种辅助符号等。由于它没有规律可循,在更换图书分类法或图书分类法修订后需要改编图书或分类目录时,就

无法将新旧目录排在一起。各图书馆想了不少办法,如将新书排在前面,旧书排在后面。但由于号码前后不同,造成人为的复杂,很难为读者掌握,读者抄录索书号不规范的情况时有发生,给取还书造成很大困难。如某藏书量甚丰的图书馆,由于经常产生上述情况,经过慎重考虑仍将不同分类法的分类目录分开排列。这又造成分类目录多头,浪费了人力物力,给管理和读者均带来不便。读者找同一性质的书,要分别查找不同的目录。

以书名取号,往往由于书名的字数较多,若一律规定以前三字取号,则会造成重号字多,而书名前面的文字往往是无实际意义的冠词,用以取号不合适;若规定取关键词,则各人选择的标准难以统一,即使附加取书名的规则,也很可能前后取词不一致,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以出版年取号,80年代初期曾有人极力主张,但重号率高,若加各种附加符号,可长达10余位。而各种附加符号表达的内容又很难取得一致,达不到简便的要求。

权衡比较各种取书次号方法,还是以著者取书次号比较合适。著者号既是分类某种意义上的深化和延续,而且是书的重要特征。它不仅有规律可循,更重要的是著者是一书的重要检索点。读者常常就某书的著者提出咨询。著者目录又是图书馆目录体系的主要成员。即使在分类时,著者也是分类员进行主题分析经常考虑的因素之一,它可以帮助分类员决定一书的学科内容。因为某一专门学者的著作是有其一定的学科范围的。如李四光的著作主要是有关地质科学的,薛暮桥的著作主要是有关经济学的,陈景润的著作主要是有关数学的,等等。这也许就是经过各种方法的试验和多家争鸣,仍以著者号作书次号的意见占优势的原因吧。

是音序好还是形序好

以著者取号作书次号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几十年来, 经过不断努力, 编制的著者号码表近百种。或以音序, 或以形序。或用查号法, 或用拼号法。但还没有为图书馆界公认的较好的著者号码表问世。为什么呢? 有人认为是由于汉字的特点。以汉字字形特征为依据取形, 部首法、四角号码法、笔划法、形位法虽各有其优点, 但人们书写习惯不同, 笔划数法不同, 汉字简化后笔划、笔形和笔顺均有变化, 前几年又有新的简化字推出, 汉字难以标准稳定。汉语拼音方案推广以后, 主张用音序编制著者号码的逐渐增多, 也作了很大努力。但汉语同音字多, 如章、张和姜、江。还存在着多音多义字, 读音不同意义也不相同, 如长短的长和生长的长, 反省的省和节省的省。遇到同音字还要规定按字形区分。同音字多, 重号就多。虽然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按照姓氏出现的频率科学地分配了号码, 使重号率大大减少(如河南省和浙江省新编的表), 但重号率仍然不低, 还要加各种附加符号。就以作为国家标准送审稿的《中文同类书排列规则——汉语著者号码表》为例, 同著者的不同著作, 号码可长至 5 位。莎士比亚著《李尔王》号码为 S039e, 而《李尔王》的第 2 种译本号码为 S039e-2 长到 7 位。以往的著者号码表, 编制时均以姓氏为主, 对不同姓的同音字、同著者的不同著作, 同著者同著作的不同版本、译本以及同著者同著作的不同卷册等情况均需加附加符号; 据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情况有的可多至 12 位符号。用汉语拼音编制著者号码表虽然比较标准和稳定, 但实际号码并不算短。再加各种辅助

区分符号, 很难统一, 而且容易出现技术上的错误。南北方发音也有很大差异, 需辗转查对。所以, 笔者认为以音序作为编制著者号码表的方向不是最理想的。

汉字是既表音又表义的文字。音同字不同, 其意义相差甚远。如: 颜、言、炎、研、妍、盐、严、岩、延均读 yán, 但其意义迥异。有同音不同声调的, 如: 鹰、莺、樱、英、瑛读 yīng, 赢、瀛、莹、盈读 yíng, 影、颖读 yǐng。有的字虽同但表达的意义不同而改变了读音, 如前面提到的“省”, “适”(shì) 用于人名有时读“kuò”等。仅用拼音是不能确切表达字的含义的。中国人取名字注意表义。以何字为名, 是怀着各种美好的愿望、远大理想和抱负的。虽说人名只是人的代号, 但在取名时寄予期望则是我国的传统, 用音是无法表达的。若能以汉字姓名编著者号码表可能更受欢迎, 因为有同志作过试验, 用姓名取号比用姓氏取号重号率要低。有同志认为, 以姓名取号收汉字太多(现认为收字以 2000~3000 为合适), 著者号码表就无法编了。以往可能是这样, 但随着计算机在图书馆的应用和汉字编码法的逐步完善, 我想这将不是空想。君不见, 用汉字编码输入计算机不是比输入拉丁字母的速度还快吗?

对书次号标准化的要求

书次号虽不是文献整序工作中的首要问题, 但却是必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书次号的标准化已是迫在眉睫。以往认为由于各家所用图书分类法不统一, 谈书次号统一缺乏统一的基础, 因此应首先统一图书分类法。这个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也不是绝对的)。现在《中图法》的用户已经占 95% 以上。《科图法》的用户遍及全国科学院系统和某些大学和专业图书馆。我们

姑且先不论《中图法》是否能很快被批准为国家标准,《科图法》是否能与《中图法》兼容,但就其众多用户来说,也已到了统一书次号的时候了。应该不失时机做好这一工作。

前面说过,解决统一书次号的办法是编制科学的著者号码表。几十年编表的经验和对几十种成果的检验已经充分说明,仅仅统计姓氏的使用频率,根据使用频率来合理分配号码,以减少重号率的做法不一定是最佳编制方式。不改变原有编制模式,根本问题不彻底解决,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即使能够以国家标准的名义推荐,恐怕使用者也寥寥。

那么,什么是编制著者号码表的标准要求呢?笔者认为科学的著者号码表应具有规律性、准确性、简便性和适应性。

(一)规律性。即取号要符合规律。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符合图书分类的规律,要能反映书的特征,能起分类的深化作用。二是能和图书馆的目录体系互相配合,简化排检手续。如果能达到作为分类索书号第2排号的著者号是同类号下图书个别化的标识,那么将著者号放在分类号的前面,即可作为著者目录的排序号。这样就会改变虽以著者取号但和组织著者目录无关的现状。

(二)准确性。既然以著者取号,就要力争能准确无误地反映著者的姓名,要能区分同姓名而不为一人,改变过去那种音同字不同无法显示的状况,甚至包括过去无法显示的集体著者。

(三)简便性。过去对简便性的理解是号码短。由于多种原因,著者号码表的基本号是3位数加姓氏的首字母,共4位数,仍不能避免重号;再加其他辅助区分号,长达10~12位符号亦不少见。实际上达不到简短的目的。由于加多种区分符

号,还可能发生技术上的错误。是否可以这样设想,即用简单的取号规则,无须辗转查表取号,不附加任何分隔区分符号,即可达到区分同著者的不同著作,同著者同著作的不同版本、译本等等,即使其号略长一点亦应是简便的。

(四)适应性。这也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求号码有伸缩性,可以随时增添著者,可容纳几十万著者姓名的用字。出现新的著者也有号码可供应用。二是指既可用机器配置,亦可为尚不具备配置微机条件的图书馆使用。

以上要求是否能做到呢?我以为,随着计算机在图书馆工作中的普遍应用,汉字编码法的不断完善,有为祖国争光的精神,梦想终可成为现实。我们急切地期待着。

参考文献

- (1) 全国情报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文同类书排列规则——汉语著者号码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草案送审稿).1990.12.
- (2) 浙江图书馆学会.陆宗诚等主编.中文同类书字顺号码表.1990.5.
- (3) 河南省图书馆学会著者号课题调研组.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1990.5.
- (4) 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座谈会纪要.图书馆学通讯.1960.3.
- (5) 黄俊贵.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同类书排列问题探讨.1980.3.
- (6) 商志馥.论书次号.广东图书馆学刊.1981.2.
- (7) 赵怀生,远文遂.书次号标准化势在必行.河南图书馆学刊.1990.2.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来稿时间:1991.3。编发者:刘喜申。)

Science.—1991, 17 (4) .—9~11

It is an article that makes a specialized study of the methods to use the number "O"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Libraries. The whole text falls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s the five different occasions of using the number "O"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Libraries, the second part analyses the four items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adding of the number "O" to the classification number given while conducting the indexing service. By giving over 30 typical examples, the author discusses quite comprehensively but briefly the using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Libraries "O", particularly its using in some special circumstances, which helps a lot to make a standard use of the third edi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Library——Structures

Symbols——Studies

G254.122

The Standardization Problems of Arranging Books of Same Class / Li Yan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91, 17 (4) .—12~16

The standardization of book numbers has become extremely urgent for the time being. The way to unify book numbers is to compile a very systematic and exact author number list. It is not necessarily the best way to compile an author number list by merely counting the utility frequency of surnames, and on the basis of which, have the numbers allotted reasonably so as to reduce the duplication rate of numbers. The scientific standard of compiling author number list are regularity, exactitude, simplicity and adaptability.

Book number——Studies

Author number list——Studies

G254.13

Contributions Made by the British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Group to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Language / Zhang Shaohong and Dai Weimin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91, 17 (4) .—17~22

The British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Group (CRG) was set up in February, 1952, with Wells, Acheson etc. as its members. It has taken form of twelve conference bulletins so far. The article introduces four aspects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achievements of the group: 1.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language (including theories of the general classification, the aggregative gradation and the facet classification; 2. The compilation of classifications (including more than ten professional facet classifications, such as the "British Electricity Facet Classification" and the general classification of BSO); 3. The revision of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s (including the "Bibliographic Classification" and the UDC, etc.); 4.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new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language (including designing for a facet thesaurus, and a preserved context indexing system, making the experiment of Clancy and setting up relative indexing of